

爱我中华三部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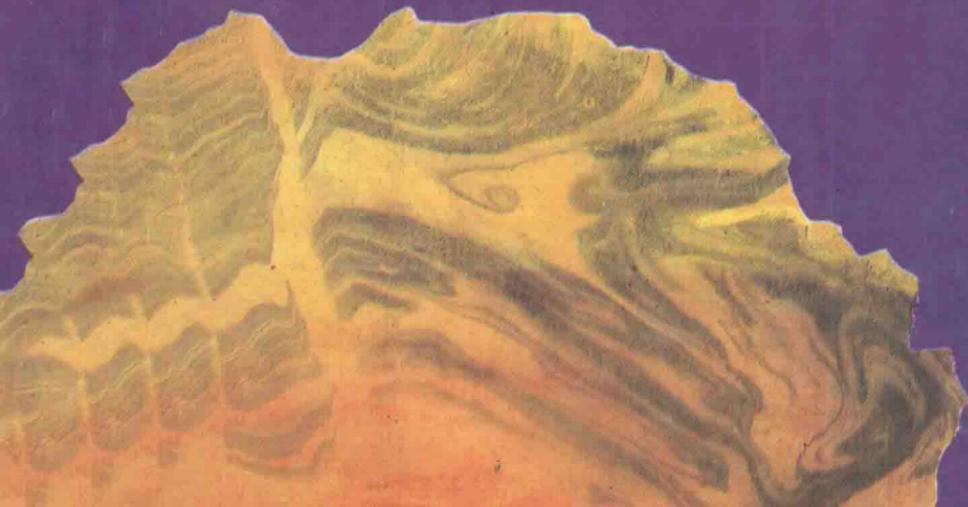
□主编 / 姚公骞 / 汪叔子

Aiwozhonghuasanbuqu

□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爱我中华三部曲 1



爱国情

■主编 / 姚公雋 / 汪叔子

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(赣)新登字第005号

书名: 爱国情

主编: 姚公騄 汪叔子

出版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5号)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江西新华印刷二厂
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 9.25

字 数: 220千

版 次: 1994年12月第1版第3次印刷

印 数: 9,001—14,000

定 价: 7.80元

ISBN7—80579—443—X/I·364

邮政编码: 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卷首语 唱给昨天的歌

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
五千年史，悠悠沧桑。
文明不断，巍然独存，
万劫不磨，行健自强。
炎黄子孙，追求一统，
民族融合，国运兴旺。
江山如画，英雄折腰，
爱国之歌，龙吟虎唱。
仁人志士，气贯长虹，
山河动容，日月共光。
哲人才子，文采风流，
启迪后人，功德无量。
科技发明，史不绝书，
如薪传火，举世共享。
历史长河，灿烂日出，
古老文明，新的篇章。

一、国 魂 颂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

陕西黄陵县的桥山、湖南酃县的洣水，就有这种灵，就有这种名。

这里的山山水水，日夜陪伴着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——炎黄两帝。

炎黄两帝，统一了百余个部族，发现了五谷百草、养蚕织丝、文字音乐……“成命百物，以明民共财”。从此，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，写下了第一页，中华民族的先祖，有了最初的生存空间。

漫步黄河岸边，浊浪滔天向我们发问；登上泰山之巅，天风浩荡向我们发问；面对着祖先为我们开创的一方热土，为我们保留的一片蓝天，我们用什么来回报祖先？

根，深扎在这方热土，我们是一簇簇绿叶；云，依恋着这片蓝天，我们是一朵朵雯华。耿耿忠心，跃如红日；铮铮铁骨，强似苍松。我们回报祖先的，是炎黄子孙那滚烫的赤子心，那闪光的爱国情。

爱国情怀，是中华民族感情世界内最伟大崇高的感情。它可以跨越时空，成为中华之歌的永恒主题。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中国人，无论他浪迹天涯，还是走遍海角，只要一想起雄伟壮丽的祖国山河，冠绝世界的古代文明、辉煌灿烂的悠久历史，心中都会油然升起一股沉甸甸的自豪之情。这种感情的力量之伟大，可以驱使古往今来的爱国志士，甘愿为脚下这一片故土献出热泪、汗水和鲜血。中国历史上的每一页，都有这种情怀的见证。

黄帝陵前，留下了多少文人墨客的怀旧追思、多少先贤君王的祈祷敬慕、多少海外赤子的寻根情结。然而，蘸满激情、酣洒地抒发了后代对祖先的赤诚之情者，是一位时代巨人为黄帝写下的祭词。

1937年春，正当中华民族筑起血肉长城抵抗东洋魔爪之际，毛泽东用他那双指挥过秋收起义、井冈山斗争和铁流二万五千里的巨手，对着黄帝的在天之灵，在大地上刻下了中华儿女誓死保卫家园的心迹：

赫赫始祖，吾华肇造；
胄衍祀绵，岳峨河浩。
聪明睿智，光披遐荒；
建此伟业，雄立东方。

世变沧桑，中更蹉跌；
越数千年，强邻蔑德。

.....

懿维我祖，命世之英；
涿鹿奋战，区宇以宁。
岂其苗裔，不武如斯；
泱泱大国，让其沦胥。
东等不才，剑履俱奋；
万里崎岖，为国效命。
频年苦斗，备历险夷；
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。

.....

还我河山，卫我国权；
此物此志，永矢勿谖。

据说汉武帝征朔方还，在黄帝陵前祭黄，筑台祈仙。如今，那块写有“汉武仙台”的石碑，仍时时向后人们叙述着这段历史。

传说宋太祖当了皇帝后，遍处查访古帝陵寝，在梦中得神指点，知炎帝陵在湖南茶乡。于是派人实访，果然寻得，始建祠坊。如今，炎帝陵前的一块刻碑，仍日日向后人们叙述着这个故事。

上自夏、商、周三代、下至汉、隋、唐、宋、明王朝王族，还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，如辽、金、元、清，都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、黄帝苗裔、尊黄祀黄如祖。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“炎黄子孙”的观念，才一次次克服了民族分裂的危机，保持了中国的大体统一。

中国的统一，免不了刀光剑影、血的蒸发、灵的哭号。但更多的，则是民族团结的佳话。

中华民族的先祖们，共同开发了中国的辽阔疆域，经历了漫漫岁月，才缔造出了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肃慎、东胡等族开

拓了东北地区；狄、匈奴等族开发了北部草原地区；西域的乌孙、月氏诸族开发了新疆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；羌、戎、氐等族开发了青藏高原的广大地区；华夏、夷、三苗等族开发了黄河流域、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……中国历史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写成的。各族人民在开发疆土的过程中，在经济差异、迁徙、通婚、杂居等因素的作用下，形成了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的格局，使得中华民族的各民族间有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血缘关系。

各民族的先民不仅缔造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，而且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。少数民族很早就掌握了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，并将之传入内地。少数民族培育的蒙古马、宁夏滩羊、东北紫貂、驯鹿，至今还闻名于世。在盐、铁的制作和冶炼、棉花的种植和纺织，以及建筑业等手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，都有少数民族的创造发明和杰出贡献。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，通过商业贸易，沟通了横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，充当了建立东西交通的先驱和中外交流的使者。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就是通过回回和蒙古人传到阿拉伯世界、再传入西欧的，对世界文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——敦煌的石窟艺术，就是各族先辈为后代留下的宝贵遗产。

中华民族的历史上，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、科学家、发明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，其中不少杰出人物来自少数民族。如匈奴的呼韩邪单于、鲜卑的拓跋珪、吐蕃的松赞干布、回纥的吐迷度、契丹的阿保机和耶律楚材、蒙古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、女真的阿骨打、满族的努尔哈赤和爱新觉罗玄烨等，以及回族的札马鲁丁、郑和、李贽，维吾尔族的马哈木德·喀什噶里和鲁明善，蒙古族的脱脱和明安图，满族的曹雪芹等等，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。

去问问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君王吧！他们的帝国有这种内聚核心和民族融合吗？它可以解释中国数千年历史上，为什么统一有三分之二长。而且越到后来，统一的时间越长、统一的局

面越巩固，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凝聚力，如薪传火，历万代而不熄。

民族融合，国兴；民族不和，国衰。不但中国人意识到这一点，就是当年的亚历山大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他曾举行了世界上最早最大的集体婚礼，他同他的 90 个将领和朋友们一起娶了征服地的波斯新娘。这场大规模的婚礼形成了一个非常辉煌的节日，与此同时，他的马其顿士兵娶亚洲女子为妻的有几千人，举行婚礼时，全都受到赐予的礼物。这件事被称为是欧亚联姻。亚历山大想通过这种方式，使他的帝国千秋万代永存于世。

但是，民族的融合不可能通过简单的联姻便大功告成。何况亚历山大命运不济，大帝国成立数年后便寿终正寝，他的民族融合之梦也告破灭，分裂的阴影便逐渐降落在昔日大帝国的版图上。

从东汉末年(220 年)到隋朝重新统一，中国经历了 360 余年的分裂。然而各分裂政权仍自称中国，仍有共同的文化、共同的文字和共同的思想。罗马帝国自公元 395 年也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，但它的命运和中国大不相同，中国最后复归了更高度的统一，罗马帝国则一直分裂到各自灭亡。

民族融和，为中华民族铸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。但是，我们也不否认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曾有过的敌对和战争。而且，就是同一民族中，也有过争夺统一权的鼎立和征伐。

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

到西子湖畔的游人，总忘不了去凭吊一下岳王庙和岳墓。

庙殿当中，岳飞头戴红缨帅盔，身着紫色蟒袍，臂露金甲，足登武靴，右手握拳胸前，左手按剑身侧，正气凛然，气概非凡。岳飞手迹“还我河山”四个大字，正悬上方，显得遒劲而又苍凉。

岳墓照壁上嵌有明人洪珠手书：“尽忠报国”，四个铁人面墓而跪，墓阙上有一联语：“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铁无辜铸佞臣”。

把岳飞看成是民族英雄，会不会和民族融合的需要相矛盾呢？

历史学家对此当然不会漠不关心。1986年，来自全国的50多位历史学家，聚集西湖畔，召开了首届岳飞研讨会。结果是一致地肯定了岳飞民族英雄的地位。因为，岳飞的抗金斗争，不仅抵御了女真奴隶主贵族掠夺性的烧杀，使东南半壁河山的各族人民尽可能减少伤害，而且还保卫了当时高度发达的生产方式和精神文化，使之免遭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精神文化的蹂躏。这不仅符合广大汉族人民的利益，而且对女真族的长远利益来说，不会有任何危害，更不用说对其他民族的人民了。岳飞的抗金斗争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，是有利而积极的，他被称为民族英雄是当之无愧的。

历史学家们的这种观点，至今仍有不可动摇的影响。仿佛和历史学家们有某种默契，西湖畔游人们对岳飞的崇仰和对秦桧的唾弃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，鲜明地说明了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。

无需为尊者讳，古人的爱国和今人的爱国，无论是地理概念上，还是政治内容上，都有着不言而喻的“代沟”。限于古代的认识条件之不足，古人们的爱国可能只是一种本民族的“乡土意识”，甚至是一种忠君的封建意识。

楚国大夫屈原，忠于楚王社稷，虽九死亦犹未悔。“岂余身之惮殃兮，恐皇舆之败绩。”闻知都破国亡，忠君无路，便以投江自尽的方式表达了对楚国的忠诚；

《苏武牧羊》唱道：“苏武牧羊北海边，雪地又冰天，苦忍19年，渴饮雪、饥吞毡，牧羊北海边。心存汉社稷，旄落犹未还”，留胡节不辱，表达了对汉王朝的忠诚；

三国时期关羽对刘备蜀国的忠心，是有口皆碑的故事。他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，千里走单骑，以至于过五关斩六将，拒绝了曹操对他的一片挽留之情。没有关云长的这种赤胆忠义，关公祠内哪得香火绵绵？

辛弃疾的“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”，陆游的“千年

史策耻无名，一片丹心报天子”，岳飞的“尽忠报国”“朝天阙”、“归来报明主、恢复旧神州”，文天祥唱完正气歌后，面南而跪从容就义，都是“忠君爱国”、将“君”与“国”视同一体的表现。

从今天的观点来看，这都不过是在中国本身不同民族和政治集团之间斗争中的一种“气节”，带有浓厚的封建忠君思想，使古代杰出人物的爱国主义受到局限，自然不足为法。

然而，不要忘记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：“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。”列宁的这句话，揭示了我们今天的爱国热血中，奔流着昨日的遗传。

爱国主义有它的时代内容，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得到更新的。古人的局限我们当然要突破，但历史又不能割裂，先辈们为保卫家园而用鲜血铸就的“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”、“富贵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”的英勇气概，却可以升华成一种民族气节，成为时代的主旋律——爱国主义中永远跳跃着的音符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。

忽必烈对文天祥的忠义深为敬佩，他对文天祥说：“你如果能像对待宋朝那样对待我，立即就任命你为宰相。”文天祥就义后，这位元世祖“赠公太保、中书平章政事、庐陵郡公，设坛致祭”，并叹息道：“好男子，不为我用，杀之诚可惜也。”

清政府为岳飞重修庙宇、祀岳飞塑像，说明就是女真族的后代也对英雄怀有崇尚之情。

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，对岳飞、文天祥也曾予以高度的评价。1933年，他在瑞金看京剧《岳母刺字》时，向警卫人员说：“岳飞是个民族英雄，他精忠报国，全心为民，抵抗外军侵略。我们要向他学习。”毛泽东几次路过河南汤阴，参观岳庙，称赞岳飞。1958年5月在八大的一次会议上，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年轻有为的名人，其中就有岳飞。他在读新、旧《唐书·徐有功传》时，联想到历史上为真理而献身的英雄，批注道：“岳飞、文天祥、曾静、戴名

世、瞿秋白、方志敏、邓演达、杨虎城、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，不亦伟大乎！”竟将岳飞、文天祥和瞿秋白、方志敏等革命先辈相提并论，列为历史伟人，可见岳飞、文天祥在领袖心目中占有多么崇高的地位！

相反，那些首鼠两端，为个人野心而朝秦暮楚之徒，非但在历史耻辱柱上遗臭万年，就是他们的亲身结局，也未必是荣华富贵相伴。

吴三桂初效明廷，收到李自成的厚礼后，又效大顺。闻知爱妾被俘，又为一红颜向多尔袞雍发称臣。当康熙统一大业已成定局时，又野心膨胀而起兵叛乱，终落得个骨骸四拆、传示天下的悲惨下场。

少数民族也有各自的民族英雄。女真族的阿骨打、蒙古族的成吉思汗、满族的努尔哈赤，都是维护民族正当权益的杰出代表。今天，也都跨越了民族界限，在中华英雄谱上熠熠闪光。

炎黄子孙、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感，崇尚气节、威武不屈的爱国传统，就是中华的国魂。

二、脊 梁 赞

拔地而起、与天相连的，是山的脊梁。它虎踞于群山之巅，龙盘于险峰之上，拥抱着日月，拥抱着蓝天，使山脉永远保持着威严。

看见这群山峥嵘的脊梁，就会联想起中国历史上那些仁人志士、民族栋梁。

一位日本人说，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最了解中国。这两个半人中就有一个是鲁迅。

童年时代的鲁迅，十分喜爱神话故事。一部绘图的《山海经》，画着人面的兽、九头的鸟，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等。鲁迅把这部《山海经》称为“最心爱的宝书”。

那个无头而以两乳作眼的怪物，就是中国神话中的刑天。刑天同天帝争权，失败后被砍去头颅。但他仍不屈服，以两乳为眼，以肚脐为嘴，左手拿盾、右手拿斧，威风凛凛地继续同天帝斗争。

鲁迅幼小的心灵中，充满了对英雄的敬仰。

但是，当鲁迅审视了中国历史之后，他发现了另外一种更深沉的伟大：“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‘正史’，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，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

历代改革家，舍身求“法”，变法图强，他们是中国的脊梁。

改革的祭坛上，留下了商鞅的鲜血，留下了王安石等人的遗恨。这血，这恨，是日月精华所炼成，闪烁着一种古典的浩然正气，呈现着一种悲壮的血染的风采，启迪着后人。

商鞅被车裂了，但秦国不正是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走向了富国强兵、问鼎天下的胜利吗？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商鞅变法成功了。

王安石的变法遭到了废止的命运，但他留下的三句话却表现了改革家应有的风骨。那就是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。难怪王安石会引起列宁的注意和赞扬，被誉为“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”。

张居正死后，他的新政即告废除，支持他改革的官员也被罢官贬谪，张居正一家被迫害致死达 10 余人，张居正本人也几乎被掘墓鞭尸。但明王朝亦因此而更加腐朽、更加衰落。

改革并不是悲剧的同义语。成功的改革也不乏其例。战国的管仲、子产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，连风俗都改变了，还有北魏孝文帝的改革。这说明中国改革史不仅有先驱的遗恨和鲜血，也有他们的欢悦和成功。

谁说中国人生性保守，不思变道？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，曾掀起一个个改革巨浪，改革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。《周易·杂卦》有语：“革，去故也；鼎，取新也。”提出了革故鼎新的观念。中国

历史上的一切变法、维新，乃至起义、革命，都是“日新”、“革故鼎新”的体现。

历代走出国门、推行开放改革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者，也是中国的脊梁。

站在小溪边，看到的是小溪；

站到大海边，看到的是大海。

《庄子·秋水》早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，说的是河神因“泾流之大”，自以为“天下之美为尽在己”。但它冲到海边一看，才发现了自己的渺小，便望洋兴叹：“今我睹子之难穷也，吾非至于子之门，则殆矣，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。”海神劝慰它说，你冲出壅塞河道，看到了自己的局限，可以“语大理矣！”

中国并不是某些“精英”所说的那样，筑起一道万里长城后，就把自己围在里面作井底之蛙。翻开历史，西汉之张骞、东汉之班超、晋之法显、唐之玄奘、鉴真、明之郑和，还有最早向国人介绍西学的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，早就奏响了走向世界的交响曲。同样，中国也并非素来喜好闭关自守。汉、唐、元国门大开，友好地接待了来自普天之下的各国使臣、旅行家、工匠、留学生、商人、教士。汉唐都城长安、元代都城大都（北京），成了当时的世界之都，显示了中华民族宏伟开阔的气度、中华文化吞吐容纳的力量。尤值一提的是，唐王朝不仅重视拔擢本国人才，对于异族异国的人才也十分器重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、新罗的崔致远、大食的李彦升等，都在唐朝做官。唐玄宗时，还任命 32 名蕃人为将。还有印度人被聘于司天台工作，贡献甚多。元代，国土混一欧亚，来华外人更多。著名者有爱薛、李罗、马可波罗等。马可波罗在朝廷任官 17 载，衔命巡视各地。回国后写的《游记》，在欧洲引起轰动，使中国之名在欧洲传为美谈。哥伦布憧憬东方，很大程度上是这部《游记》的鼓动。明朝，西学东渐，一大批欧洲硕学之士在将“天学”带到中国的同时，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、哲学伦理。中国一代有识之士，如徐光启、李之藻、王徵、

方以智等人，或译《几何原本》、《泰西水法》、《同文指算》，或编《天学初函》，或著《农政全书》，将西人的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水利等先进知识，介绍给了中国，在理学正盛的大地上，掀起了一股异质圈文化的清新之风。清初，康熙皇帝聘西人为师，日讲天文、数学、钦编《数理精蕴》，更是历朝帝王中开新风之佼佼者。

甘洒热血谱春秋、不向权贵半低头的志士仁人，是中华脊梁的傲骨。

他们或嫉恶如仇，在内外黑暗势力面前，表现出英勇不屈的斗争气概，正义所在，拼命为之，不畏横逆，前仆后继。东汉后期的“党锢之争”、明朝后期的“东林党人”，便是这种精神的如实写照；

他们或仗义执言，秉笔直书，面对屠刀，置生死于度外。齐国有三个担任史官的兄弟，因记载崔杼杀君之事先后被害。但第四个继任史官的弟弟仍毫不畏惧，照记不误。崔杼无法，只得让自己的杀君之事永远被记载在史书上；

他们或威武不屈，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，敢以血肉之躯拼作长城。唐朝叛将安禄山围困睢阳时，守官张巡率兵死守数月，每次上阵督战，都要大声叫喊，牙齿都被咬碎。城破被俘后，拒绝投降。当叛兵将刀刺进他口中时，仍叫骂不止，慷慨牺牲；

他们或忧国忧民，为政勤廉。成汤剪发断甲、桑林祷雨、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、“关西孔子”杨震拒贿有方、诸葛亮“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”、包拯的“皇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”、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、海瑞平反冤狱、打击豪强，以至于“市一棺、诀妻子”，冒着“触忤当死”的危险，上书皇帝为民请命，何等的无畏和勇敢！诚然，历史上的这些“清官”都有他们的局限之处，但他们身上闪烁着的“民为贵”的光彩，却永照千秋，他们的这种精神，在一代代的中国人的心中化作了伟岸的丰碑。

志士仁人、改革家、开眼看世界的先驱，就是中国历史上英勇不屈的刑天、追求光明的夸父、自强不息的精卫、矢志不渝的愚公，

就是中华的风骨，中华的脊梁。中国有了这种脊梁，就有了顶天立地的昆仑，就有了顶天立地的泰山。“地维赖以立、天柱赖以尊”。沧海横流，英雄本色；地塌天裂，愈显刚强。

三、文明吟

西方历史学家在描述历史时，多半有一种白人优越感和欧洲中心论。然而，在谈到中国古代文明时，笔端下的傲慢就会打上折扣，甚至是让位于尊敬。

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·肯尼迪，在其著《大国的兴衰》（求实出版社 1989 年中译本）的第一章第一节便承认：“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，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、更先进。”

中华古代文明，是古代物质文化、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的总和。是人类封建时代文明中发展水平最高的文明之一。它突出地表现在：素称发达的农业、手工业；独树一帜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；开启近代文明先河的科学技术；各领一代风骚的文学艺术；政治、哲学、军事学方面的智慧之光。中国向世界的奉献，不仅有她的物质文化，而且还有她的制度、思想文化。

在思想文化领域中，我们的祖先在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文化学、军事学、历史学、文学、教育、哲学、戏曲学及伦理道德方面，创造了罕有其匹的古代文明。有些理论学说，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尚，至今仍有积极的教育意义。如孟子的“民贵君轻论”、“富贵不能淫、贫贱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”；荀子的“制天命而用之”；管子的“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”；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；顾炎武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等等，都是我们民族独特的气质和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晶，百世不衰，寓意常在。

以历史学而论，中国史学文献浩如烟海，仅一部《二十四史》，

就是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观。从历史文献中，人们既可看到昏君奸相弄权误国，也可看到杰出人物伟大作为，了解到中华民族革新进取的意识、民族凝聚的过程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勾划了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宏伟画卷，在民族传、地理志中更有突出反映。

以思想流派而论，春秋战国时代的“百家争鸣”，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独有现象。“孔北老南、双圣互峙，九流十家、断轨并作。如春雷一声，万绪齐绌于旷野；如火山乍裂，热石竞飞于天外。壮哉壮哉！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，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。”

如果说，这是梁启超对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文化所作的概括和赞叹，那末，在观诸中国数千年文化史后，就更令人叫绝不已了。从先秦诸子学到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隋唐佛学、宋明理学、直至清代朴学，这种依次出现的文化形态，既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内涵，又折射出各自的特有光彩。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像中国文化一样，既悠久古老又没有割断传统？中华文化这种再生、更新能力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文化传统上的反映；

以文学艺术而论，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古彩瑰丽；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淳美优雅；文学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等结构恢宏；

以文物古迹而论，有饮誉中外的秦陵兵马俑；有敦煌、麦积山、龙门、云冈石窟的绘画雕刻，堪称为世界奇观。法国前总理雅克·希拉克参观了兵马俑那宏阔壮观的场面后，大为惊叹：“世界上有了七大奇迹，秦俑的发现，可以说是八大奇迹了。”矜持高傲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拜服于这一奇迹之下：“真是气壮山河，秦始皇这个人的气魄不小！”

在制度文化领域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、郡县制、经济制度、科举制度曾给东亚以深刻影响，尤以唐代为甚，形成了具有共同制度要素的中华文化圈。

中国的思想名人，更如苍穹之下的繁星，数不胜数。孔子、孟

子、孙子、老子、二程、朱熹等等，他们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当代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，1985年美国出版的《名人年鉴手册》中，列出了世界十大著名思想家，位于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哥白尼、培根、牛顿、达尔文、伏尔泰、康德、阿奎那这些泰斗之前的，是中国的孔子。

中国军事理论家孙子及其《孙子兵法》，是兵家文化的杰出代表。2500年来，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孙子被誉为“东方兵家鼻祖”，《孙子兵法》被誉为“兵学圣典”、“世界古代第一兵书”。国外许多军事理论专著和一流军事学院的教科书中，孙子的名字赫然位于亚历山大、拿破仑、克劳塞维茨等军事家之首。西方许多权威人士认为，孙子是超越中华文化圈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少数中国伟人之一。拿破仑看到《孙子兵法》的法译本后，对该书推崇备至，常在作战中挑灯夜读，并将其中一些经典原则在实践中加以应用。德皇威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读了《孙子兵法》，感慨万分，叹息道：“可惜我20年前没有看到这本书。”英国蒙哥马利元帅1961年会见毛泽东时，提出要把《孙子兵法》作为各国军事学院的教材。美国的西点军校等都把《孙子兵法》列为必修课。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格雷上将曾在1989年决定将《孙子兵法》作为陆战队1990年军官必读书的第一本。格雷在训令中指出：“孙子的作战思想在今天仍如2500年前一样适用，是当今实施运动战的基础。”尼克松、基辛格、布热津斯基等美国著名战略家都在著作中多次引用孙子的名言，并且在谋划美国全球战略时借鉴孙子的思想。越南战争时，美战略家柯林斯说：“美国忽视了孙子‘上兵伐谋’的英明忠告，愚蠢地投入了战争。”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离任后偶然读到《孙子兵法》，其中“兵贵胜、不贵久”的原则使他茅塞顿开，由主战派一变为主和派，到处宣传孙子的“兵久而国利者，未之有也”的警言，积极呼吁美军尽早撤出越南。直到最近的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，美军都把孙子的作战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去。可以说，世界上的兵书和军事理论书，没有一本像《孙子兵